

讀《袁同禮年譜長編》：管窺民國時期北平圖書館與中央圖書館的合作性競爭（1933-1949）

Reading Yuan Tongli: A Chronicle: The Cooperative Rivalry between the National Peping Library and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1933-1949)

宋建成 (Sung Chien-cheng) *

—

袁同禮（1895-1965）先生，字守和，是推動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先驅，領導國人圖書館經營法「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由藏書樓到近代圖書館。先生生平可略分為3個時期：1. 1924年（30歲）以前為求學游學時期；2. 1925年（31歲）至1948年（54歲）為主持國立北平圖書館（以下簡稱「平館」）時期；3. 1949年（55歲）以後為目錄著述時期。1948年12月21日清晨，先生和夫人袁慧熙（1902-1991）攜其子女袁靜（1928-2005）、袁澄（1930-2004）、袁清（1937-）同行，搭乘政府所派飛機，自北平臨時機場飛往南京明故宮機場。¹ 1949年2月2日在上海攜眷乘船遠赴美國，2月21日抵舊金山碼頭，從此旅寓美國。

上世紀有關先生傳記資料可參考的著作是稀少的。1965年2月6日先生逝世於美國華府。臺北聞耗，3月7日在國立中央圖書館（以下簡稱「央圖」）舉行先生

追悼會，並於3月6日至8日同步舉辦先生遺著展。1967年，袁慧熙、袁澄編，《思憶錄——袁守和先生紀念冊》，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收錄海內外學術文化界人士對先生追念文章，紀其業績。同年，徐家璧、袁清同輯，〈袁同禮先生中英文著述目錄〉，發表於《傳記文學》，著錄先生遺著書目82種。² 1995年12月，中國圖書館學會（臺北）紀念先生百年誕辰，在該會會訊（3：4）披載了紀念先生的文章，此即《袁同禮先生百齡冥誕紀念專輯》小冊子。³ 時理事長（央圖館長）王振鵠在本《專輯·前言》：「先生畢生盡瘁圖書館事業，主持國立北平圖書館期間，參照西法，樹立現代圖書館之規模，事業輝煌，名聞寰宇。其生平著述甚豐，其中在晚年所編著的《西文漢學書目》，素為藝林所推崇」。

2009年9月9日至10月7日中國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中國國圖」）為紀念和慶祝建館100週年，感念先生主持館務期間多方面作出卓越貢獻，特舉辦了紀念先生的活動：1. 編纂《袁同禮文集》；⁴ 2. 影印出版《袁

* 作者為國家圖書館退休副館長。

1 李書華，〈追憶袁守和先生〉，收錄於袁慧熙、袁澄編，《思憶錄——袁守和先生紀念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頁62-63。

2 徐家璧、袁清同輯，〈袁同禮先生中英文著述目錄〉，《傳記文學》10：2（1967.2）：59-62。

3 中國圖書館學會編，《袁同禮先生百齡冥誕紀念專輯》（臺北：中國圖書館學會，1995）。

4 袁同禮，《袁同禮文集》（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同禮著書目滙編》6冊（海外中國學研究書目系列），⁵「這也是這些著作首次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⁶ 3. 舉辦「紀念袁同禮先生座談會」，2010年6月1日特於文津街的古籍館舉行。後來根據本次座談會專家學者撰寫紀念文章或學術論文，出版了《袁同禮紀念文集》。

《袁同禮年譜長編》⁷（以下簡稱「《袁譜》」）是關於先生個人的編年史，敘述其生平事蹟、著作，起於1895年3月25日，迄於1965年2月10日。著者雷強，南京大學碩士畢業，北京外國語大學文學博士，中國國圖副研究館員，2010年進館服務，2013年底，因「驚訝於今人對先生知之甚少」，開始發願撰寫《袁譜》，歷時10年的蒐集、整理、考訂史料，終得以完稿問世。《袁譜》首冠序文5篇，分別由袁清、袁書菲（Sophie Volpp，袁靜的女公子，漢學家）、詹福瑞、陸建德、韓琦撰寫，以及雷強撰〈袁同禮先生小傳〉，作為《袁譜》乙書綱領性文章。次為正文和附錄。正文分為三部分：1. 譜文，即敘述譜主行狀及相關人物、事件；2. 引文，即引用的信札、電文等史料；3. 按語，即對涉及人物、事件的考證或補充說明文字。附錄「袁同禮往還書信（年代不詳）」，因無法納入正文而集中於此。未附人名索引。

《袁譜》問世後，引起中外圖書館界暨學術文化界的關注，有數篇書評，如潘銘桑〈《袁同禮年譜長編》書評〉、⁸ Yuan Zhou（周原）“Yuan Tongli: A Chronicle—Book Review”、⁹ Nicholas Morrow Williams（魏寧）“Review

of Yuan Tongli Nianpu Changbian”、¹⁰ Qing Liu（劉青）“Yuan Tongli: A Chronicle 袁同禮年譜長編, edit by Qiang Lei 雷強”、¹¹ 劉波〈十年磨劍既博且精——評《袁同禮年譜長編》〉等。¹² 雷強中譯了上開周原、劉青所撰英文書評。

《袁譜》問世之前，有關先生的年譜著作有二，1. 李文潔撰，〈袁同禮年譜簡編（1895-1949）〉、〈袁同禮論著提要〉，載於《袁同禮紀念文集》；¹³ 2. 潘梅撰《袁同禮與中國圖書館事業》，在第2冊置了3個附錄：〈袁同禮先生年譜初編〉、〈袁同禮先生著述目錄〉、〈袁同禮先生往來書信目錄（部分）〉。¹⁴ 《袁譜》與該兩年譜最主要的不同，是取材史料不同。李著所用資料主要依據相關傳記及回憶文章、平館的館史資料以及諸多同時代人物的書信和傳記；潘著原係其北京大學的博士論文，主要資料來源為北大圖書館、中國國圖檔案資料、書刊報刊資料及訪談資料；《袁譜》史料則來自先生的往來書信及著述為主，其中先生的往來書信有賴其家人提供。袁清提到：「由於我們那時在戰亂中出國，匆忙中無法將1949年以前的文件隨身帶出，因此家中原本只有自1949年至1965年間家父與友人、中外各機構的往來書信。家父去世後，這些書信交由芝加哥大學圖書館特藏部保存，即「袁同禮檔案」（Yuan Tong-li Papers），這些資料我和袁書菲盡量設法提供給雷博士利用」。「1949年前的檔案史料，幸得雷博士多方窮盡式地探詢和搜集，基本上將家

5 袁同禮，《袁同禮著書目滙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6 語見張志清，〈序〉，《袁同禮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2），頁1。

7 雷強，《袁同禮年譜長編》，5冊，（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北京：中華書局，2024）。

8 潘銘桑〈《袁同禮年譜長編》書評〉，《中國圖書館學報》51：2（2025）：51-57。

9 Yuan Zhou, “Yuan Tongli: A Chronicle—Book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10 (2025): 114-117.

10 N. M. Williams, “Review of Yuan Tongli Nianpu Changbian 袁同禮年譜長編,”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45, no. 2 (2025): 425-426.

11 Qing Liu 劉青, “Yuan Tongli: A Chronicle 袁同禮年譜長編, edited by Qiang Lei 雷強,”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21, no. 1 (2025): 126-129.

12 劉波，〈十年磨劍 既博且精——評《袁同禮年譜長編》〉，《光明日報》，2025年4月14日，第10版，https://news.gmw.cn/2025-04/14/content_37963705.htm。

13 李文潔，〈袁同禮年譜簡編（1895-1949）〉，《袁同禮紀念文集》，頁23-88；李文潔，〈袁同禮論著提要〉，《袁同禮紀念文集》，頁255-274。

14 潘梅撰，《袁同禮與中國圖書館事業》，2冊，《古典文獻研究輯刊》（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公司，2020），頁255-506。

父在中國大陸工作時期的前大半生，全景式地展現給今人」。¹⁵ 惟據載，2009年金秋，袁清應邀從美國到北京出席中國國圖百年慶典活動，攜來一大厚冊書札（數百通手札），內容可分為兩類：1. 家族事務；2. 先生在任職清華圖書館時同學與師友往來，¹⁶ 適時補充了史料。

二

筆者試從央圖的視野，閱讀《袁譜》所記述者，以野人管窺蠡測平館與央圖在各自發展圖書館事業上的合作性競爭。緣起於1933年4月8日教育部派蔣復璁（字慰堂）為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以下簡稱「籌備處」）主任。1933年4月21日籌備處開始正式辦公，1936年9月1日籌備處開放閱覽，自是，南北兩國立圖書館，遙遙相對，有如兩座燈塔，輝映全國。籌備處成立之初，蔣復璁將央圖的任務和功能定位為國家圖書館的職能來經營。

（一）出版品呈繳

1914年12月4日北京政府大總統申令公布《出版法》，規定出版的文書圖畫應於發行或散布前稟報該管警察官署，並將出版物一份送該官署，另一份經由該官署送內務部備案（第4條）。1916年4月1日內務部應教育部轉京師圖書館之請，「以行政命令通令全國各該管公署，要求稟報人按照《出版法》第四條將立案出版圖書應行稟送兩份外，再另行添送一份轉呈京師圖書館度藏，以重典策而光文治」；「1925年教育部訓令各縣，凡書店出版及私人著述圖書，應送各省教育廳署四部，一部呈教育部轉發國立京師圖書館」。¹⁷ 平館的前身京師圖書館是中國國內第一個接受出版品繳送本的國立圖書館，初顯國家圖書館的職能。

到了1930年3月28日國民政府教育部制定公布《新出圖書呈繳規程》，規定新書應由出版者呈繳四份予所在地的省（市）教育廳（局）（第1條）。教育廳

（局）除留存一份外，應將其餘三份轉送教育部。教育部核收後，發交教育部圖書館、中央教育館、中央圖書館各一份，分別保存，後兩館未成立暫由教育部圖書館代為保存（第2條）。《規程》中並未規定向平館繳送。平館多次呈文要求恢復該館接受呈繳本的地位，而至1933年6月21日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主管機關，嗣後將各書局呈繳新書，除繳本部圖書館一份外，其餘兩份，分別逕寄籌備處暨平館查收。平館再度成為法定接受呈繳本的機關。1935年春，蔣復璁代表教育部出席行政院修改出版法審查會，建議凡出版商所送出版書刊，應繳送國立圖書館一份，否則，可函請內政部予以行政處分，列入出版法中，得獲通過。1937年7月8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出版法》，出版品的接受機關改為：1. 內政部；2. 中央宣傳部；3. 地方主管公署；4. 國立圖書館；5. 立法院圖書館（第8條）。對於不履行呈繳內政部、中央宣傳部者，處三十元以下罰鍰（第35條）。但不呈繳地方主管公署、國立圖書館及立法院圖書館者卻未見處罰規定。籌備處和平館依據《出版法》為全國出版品法定呈繳機關，完整保存國家圖書文獻。《袁譜》並無上述相關記載，倒是披載了1948年8月16日先生文章，題為〈出版法修正草案意見書〉，此乃針對內政部為因應進入憲政時期，於1947年10月底呈行政院轉立法院審議的「出版法修正草案」所提意見；11月3日承行政院副秘書長浦薛鳳函覆，「該法草案第十六條及第十九條，『院會已改為分送央圖與平館』，送立法院矣」。¹⁸ 惟因1949年4月起立法院開始輾轉遷移，12月7日遷至臺北，本「修正出版法草案」未及完成立法程序。

（二）出版品國際交換

北京政府在1925年8月6日正式加入《布魯塞爾公約》（The Brussels Convention, 1886），由教育部特在北京設立出版品國際交換局，負責與締約國交換出版品事宜。1926年4月2日交換局委請北京圖書館為接

15 袁清，〈序〉，《袁同禮年譜長編》，第一冊，頁1。

16 王萚，〈袁同禮存札中清末女學資料淺析〉，《袁同禮紀念文集》，頁295。

17 李致忠，《中國國家圖書館百年紀事（1909-2009）》（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9），頁5、12。

18 參見《袁譜》，頁1767、1774。

受外國出版品機關。1926年教育部接收上海交涉使公署中美交換書報處的事務，5月將積存該處的官書（政府出版物）共25箱由滬運京轉交北京圖書館。¹⁹ 1928年8月24日大學院指令北海圖書館，在中央圖書館未成立以前，繼續辦理出版品國際交換事務。²⁰ 旋於9月4日大學院訓令北海圖書館將出版品國際交換業務移交中央研究院圖書館辦理，1928年10月中研院在上海成立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履行《公約》，專理國內外出版物交換事宜。北海圖書館則另覓蹊徑，先請已與該館建立交換機制的美國各科學機構將出版品由上海海關改寄天津海關，並尋求與國外機構、圖書館建立各種交換關係。例如出版品國際交換的主要標的是政府出版物，先生努力地與美國史密森協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爭取終獲贈一份予中國指定的交換機構籌備處外額外的一整套美國政府出版物。²¹ 其他如平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²² 蘇聯科學院東方學院、法國國家圖書館、德國帝國交換局及重要大學東方圖書館簽訂協議，²³ 約定兩館建立交換出版物；美國國會圖書館還包括交換各自印刷的書籍卡片目錄、²⁴ 法國更進一步交換館員。1934年7月1日教育部令籌備處接辦中研院出版品國際交換事務。籌備處依據《布魯塞爾公約》，代表國家進行出版品國際交換。

（三）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1933年2月蔣復璁向交通部長兼教育部部長朱家

驊建議影印《四庫全書》用以出版品國際交換，得到支持。當時正是長城血戰，北平感受威脅，政府為安全計，運送故宮博物院古物南下，典藏文淵閣《四庫全書》亦隨同南遷。蔣復璁爰建議選用文淵閣全書，在滬影印。經教育部採行，商得上海商務印書館願意承印。此舉引發學界爭議與筆戰，平館力陳「以善本替代庫本」、「每書皆須文淵與文津互校以定優劣」。²⁵ 1933年8月蔣復璁因承辦此事，作〈關於影印四庫全書未刊本之說明〉，分述「1. 辦理此事之手續；2. 選用文淵閣本之原因；3. 刊本之名稱及意義；4. 印行善本替代庫本之商榷」。²⁶

先生對影印四庫乙事曾表明「並未吹毛求疵，意存阻擾」，而是針對選印的辦法及標準提出意見。²⁷ 教育部部長王世杰函覆平館館長蔡元培和先生（先生聞係籌備處蔣某代擬），略以：「此次付印重在《四庫全書》未刊本，是以定名為《四庫全書未刊珍本》。版本追究無窮，採訪尤費時日，善本雖有，乞假非易。而於未刊本中重加選擇，則未當選之未刊本，永淪於未刊，及今不印，散佚堪虞」。²⁸ 蔣復璁曾言：「教育部回答他們的信都是我寫的，這些信現在還保存在央圖」。²⁹

教育部為平衡各方意見，專門設立「四庫未刊珍本目錄委員會」，置委員15人，負責審查籌備處所編「影印四庫全書未刊本草目」，³⁰ 期以集思廣益之效。確定了選印書目，正式定名為《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經多方努力，影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終於完成，四部共計230

19 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第一年度報告（1926.03至1927.06）》（北京：北京圖書館，1927），頁12-14。

20 參見《袁譜》，頁217、220。另見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外交志（初稿）》（臺北：國史館，2002），頁982-983。

21 參見《袁譜》，頁221-223、226-227、228-229、235-237、251、256、262。

22 參見《袁譜》，頁546-547、559-561。

23 參見《袁譜》，頁545-546、548、556。其中蘇聯科學院東方學院見頁548、法國國家圖書館見556、德國帝國交換局見頁545-546。

24 參見《袁譜》，頁623-624、639。

25 參見《袁譜》，頁458-459、461、463、466-467、469、471-472。

26 見〈館史史料選輯〉，《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1（1983.04）：頁102-104。

27 參見《袁譜》，頁479-480。

28 參見《袁譜》，頁466-467、469。

29 黃克武編撰，《蔣復璁口述回憶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54。

30 參見《袁譜》，頁472、474、479-480、481、482、485-486。

種 1,960 冊，其中經部書 60 種 517 冊；史部書 19 種 272 冊；子部書 34 種 401 冊；集部書 117 種 770 冊。³¹ 印成 1,500 部，籌備處將所得 150 部，故宮除自留 2 部參考外，以 100 部備供向國外交換西書，其餘分贈國內重要學術機關。

(四) 戰時向國外徵集圖書

抗戰軍興，圖書館被燬慘重，而圖書的損失尤難數計。「全國 113 所文化機關（其中包括大學 47 所）西遷內地，對於圖書及儀器之設備均感缺乏」。³² 1937 年 11 月起，先生首將各地圖書館被燬經過報知歐美各國，如致函洛克菲勒基金會 Selskar M. Gunn、美國史密斯森協會 Charles G. Abbot、瑞典 Sven A. Hedin（斯文赫定）。³³ 次則徵求書籍，在各國通都大邑，指定收書地點，廣募圖書，免費運華。先生用中華圖書館協會（以下簡稱「中華協會」）理事長的名義發函附備忘錄分致各國圖書館協會，³⁴ 如美國圖書館協會（以下簡稱「美國協會」）、英、德、新（紐）、法國圖書館協會、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IFLA）、美國專門、猶他（Utah）、北達州（State of North Dakota）圖書館協會、日內瓦世界文化合作協會等，徵求圖書，謀求恢復各館館藏。同時中華協會又致駐外各使館公函，請其協助。³⁵

先生主要連絡對象是以美英兩國圖書館協會作中心，來展開此一運動。1937 年 11 月 19 日先生分別致函國會圖書館館長 George Herbert Putnam，請該館作為美國各界援華捐書的暫存中心之一；³⁶ 美國協會執行祕

書 Carl H. Milam³⁷ 和主席 Harrison W. Craver，³⁸ 請該協會給予支援，懇請成立專門委員會負責組織美國各界援華捐助圖書。12 月 22 日先生再致函 Carl H. Milam，盼望該協會能夠成立一個中心負責徵集向中國捐贈的圖書。³⁹ 美國圖書館協會乃「指定由國際關係小組委員會主席 Joseph Periam Danton 主持在美徵書活動。1938 年 6 月 13-18 日該協會在密蘇里州堪薩斯市舉行第 60 屆年會，特請鮑士偉宣讀我國的請求，喚起各出席會員的注意和支持，結果產生了徵書委員會，會同國際關係小組相輔進行。⁴⁰ 1938 年 10 月 1 日美國發起為期 3 個月的「請國人捐書運華」（Asks Books for China）運動正式開始。

「1938 年 8 月間英國協會發起捐書援華運動，在該會會報（Library Association Record, 41:8）刊布徵書啓事——「供給中國精神食糧」（“Oil for the Lamps of China”），請求各學術團體及該會會員協助進行。⁴¹

1938 年 12 月 6 日在教育部指導下，全國各學術機關團體聯合成立「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向各國徵集圖書，協助被燬各圖書館從事復興工作。1939 年 1 月 14 日該會第 2 次執行委員會會議，沈祖棻代表袁同禮報告中華協會向美國協會徵集圖書情形；3 月 7 日第 4 次執委會議決：今後本會在美徵書事宜，全權委託中華協會辦理，該會募得的書籍，統由教育部分配；英國所捐書籍到海防後，由籌備處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負責運往內地，美國所捐書籍到香港後，由平館辦事處負責運往內地。⁴²

31 見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緣起〉，《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目錄·緣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頁 3、5、7、12。

32 見〈英美學術界積極援華〉，《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4:1（1939.07）:11-12。

33 參見《袁譜》，頁 807、818-819、820-821。

34 此職位於 1929 年 2 月至 1937 年 1 月稱「執行委員會主席」。見〈《中國教育文化機關被燬記實》脫稿〉，《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3:2（1938.09）:17。

35 參見宋建成，《中華圖書館協會·力謀圖書館復興》（臺北：臺灣育英社，1980），頁 136-140。

36 參見《袁譜》，頁 814-815。

37 參見《袁譜》，頁 815-816、821-822。

38 參見《袁譜》，頁 816-818、840-841。

39 參見《袁譜》，頁 827-8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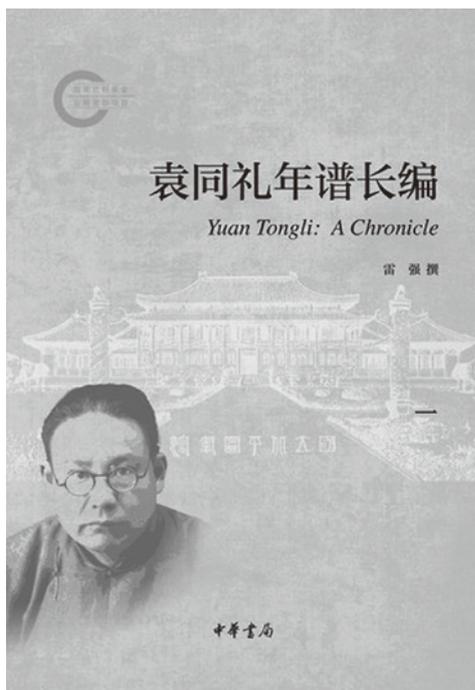
40 見徐家璧，〈袁守和先生在抗戰期間之貢獻〉，收錄於袁慧熙、袁澄編，《思憶錄——袁守和先生紀念冊》，頁 83。

41 見〈英國圖書館協會發起捐書援華運動〉，《中華協會會報》14:2/3（1939.11），頁 11-13。

42 參見《袁譜》，頁 957-958、984-985。

1939年3月10日先生發函王重民：「關於向國外徵集圖書事已與各方商定，美國方面仍由協會繼續辦理，英德法方面則由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辦理（實即蔣慰堂所策動）。先生悵然若失，認為「圖書徵集會對於英國圖書館協會等機關尚未顧到，蓋彼等對於國外情形隔膜殊甚，但既已成立，於協會在英德法之進行殊感困難。英法兩國方面除仍由平館繼續進行外，協會之工作似須停止，尊意如何？希示復。」⁴³ 1941年12月7日因太平洋戰爭爆發，書籍無法運送，徵集圖書乙事乃被迫中止。

美國被捲入戰爭，出於自身國家長期利益的考量，全面援華，在文化上，由單向美國民間團體自願的捐書援華，轉而進行中美官方雙向的文化互助與合作交流。



袁同禮年譜長篇（全五冊）

因為先生在中外學術界交遊廣闊，平館又係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北海圖書館合併組成，日積月累地與美國文化學術界間建立了友好信任的關係。1942年12月先生與費正清共同撰寫「中美文化關係備忘錄」（Memo: Sino-American Intellectual Relations），⁴⁴ 1943年3月3日先生與費氏聯名撰寫補充備忘錄，題為「援助中國學者」（Preservation of Chinese Scholarly Personnel），⁴⁵ 這兩份建議，經兩人努力予以落實，開啓了中美圖書館界暨學術文化界合作的另一篇章。

三

《袁譜》蒐集了大量的史料，包括《袁同禮檔案》及其眾多海內外相關檔案、史料匯編、報告；文集、日記、年譜、回憶錄、書信集；及圖書、期刊、報紙等。所蒐集的史料不只限於先生的，還包括了與先生同時代人物的書信和傳記資料。若從「年譜長編」體裁探源，最初概念是追求史料的齊備求全。雷博士勤於蒐集整理史料，將先生平生交往的信件全文著錄，完整的將書信文本呈現，考訂年月日時地（繫地，先生在某地的活動）、人物、事件，作有序排列，記述了先生畢生的事蹟和著述，尤其是先生主政平館時期篇幅占全書正文一半以上（55.22%）；同時因先生是「祛藏書樓之陋，植圖書館之基」近代圖書館運動的領軍人物，《袁譜》提供研究先生與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重要的參考資料。未附人名索引是書信的索引及每頁頂端標示西元年代和先生年齡的拇指索引（Thumb Index），助檢便利。《袁譜》是研究先生圖書館事業、平館館史、中國近代圖書館史的重要案頭書籍。

43 參見《袁譜》，頁985-986。

44 參見《袁譜》，頁1290。

45 參見《袁譜》，頁1309。